

我国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测算*

——基于1981年~2005年的数据分析

闫坤 刘轶芳 刘新波

【提要】1981年~2005年我国农村和城镇平均脱贫时间的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显著,而城镇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不显著。FGT贫困指数对贫困线敏感度较高,说明贫困群体具有较高的脆弱性;城镇贫困群体平均脱贫时间在个别年份出现逆转,说明我国城镇减贫工作很可能存在较大比例的易返贫群体。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均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现阶段再分配的抵消作用要大于初次分配。因此推进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公共品供给机制才是减贫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经济增长 减贫 FGT指数 平均脱贫时间指数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3)03-0039-08

一、引言

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伴随的扶贫工作也取得了重大成果。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为9.8%,在20世纪90年代为9.7%,在21世纪前十年为10.5%。1978年~2010年间,人均GDP增加近原来的13倍。贫困人口由1978年农村地区2.5亿人减少到2010年全国总数1.5亿人。^①中国的经历已经表明减少贫困的有效途径是经济增长与提高人均收入。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关于经济增长与贫困的关系以及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一直以来仍是学术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

贫困的变化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经济增长率,当收入分配状况不变时,经济增长率越高,贫困减少越快;二是收入分配状况,收入分配的恶化会减少甚至抵消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因此,严格来说,经济增长既非缓解贫困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

现有针对经济增长与贫困关系的研究可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能够使所有人都受益,因而

能够绝对地减少贫困,如:Demery&Squire(1995)^②、Roemer&Gugerty(1997)^③、Dollar&Kraay(2002)^④;另一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如果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不能使所有人都平等受益,则相对贫困会恶化,例如Adelman&Morris(1973)^⑤、Ferreira&

* 本文系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健全公共财政体系研究”(10AZD020)以及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10BJY05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在此对基金支持表示感谢。

① 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2010)发言中的数据。

② Demery, L. and Squire, L., Poverty in Africa: An Emerging Pictur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mimeo), 1995.

③ Roemer, M. and Gugerty, M., Does Economic Growth Reduce Poverty?, CAER II Discussion Paper, 1997.

④ Dollar David and Aart Kraay, 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2.

⑤ Adelman Irma and Cynthia T. Morris,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Equ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Barros (1998)^①、Besley & Burgess (2003)^②。在国内的实证研究中,如魏众、古斯塔夫森(1998)和李实、古斯塔夫森(2000)^③分析得到1988年~199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利于农村贫困减少,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则恶化贫困状况。陈绍华、王燕(2001)^④分析了1990年~1999年间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的关系,证明经济增长显著促进了贫困率的下降。林伯强(2003)^⑤认为中国的高速增长有效减少了贫困,但不平等的恶化降低了增长减少贫困的效果。胡鞍钢等(2006)^⑥对1978年~2004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贫困变动效应进行了分析。万广华等(2006)^⑦采用Shaley分解法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胡兵等(2007)^⑧利用增长曲线实证分析证明1985年~2003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利于穷人。张全红、张建华(2007)^⑨采用减贫增长率对中国1980年代至20世纪末的经济增长减贫效果进行评估。这些研究确实得到并证实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结论。

Kanbur (1987)^⑩建议将贫困人口的平均脱贫时间作为贫困的测度指标,并进而提出平均脱贫时间测度指标的最初形式,从而开辟了从脱贫时间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之路。但目前采用这一指标对我国贫困情况的实证测算研究还非常有限,张建华(2010)^⑪首次使用脱贫时间指数实证评估我国城镇1991年~2001年贫困趋势。但其研究仅限于我国城镇贫困分析,而且研究中也未给出Morduch (1998)^⑫提出的利用Watts指数变换计算平均脱贫时间指标的测度方法。基于此,本研究通过测算我国FGT贫困指数,描述我国贫困程度的演变历程;同时,较详细地解释说明采用Watts指数的单调变化来计算平均脱贫时间指标的测度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实证测算1981年~2005年我国农村和城镇的平均脱贫时间,进而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

二、我国经济增长及贫困程度的演变

(一) 贫困测度指标——FGT 贫困指数

为弥补Sen指数^⑬和SST指数^⑭不满足子群可分解性,Foster, Greer和Thorbecke (1984)^⑮建议采用公式(1)测度贫困程度(该指标称为FGT贫困指数)。

$$P_{\alpha}(y, z) = \frac{1}{n} \sum_{i=1}^q \left(\frac{g_i}{z} \right)^{\alpha} \quad \text{其中, } g_i = z - y_i \quad (1)$$

其中, z 为贫困线, y_i 为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 q 为贫困群体的人数, n 为总人数。式中,参数 $\alpha=0$ 时,指标为贫困人口指数H——总人口中贫困人口的比例;当 $\alpha=1$ 时,指标为贫困缺口PG——所有人口的收入对贫困线的相对缺口的平均值;当 $\alpha=2$ 时,指标为平方贫困距比率SPG,是相对缺口的加权平均值,权重就是相

① Ferreira Francisco and Ricardo Paes de Barros. Climbing a Moving Mountain: Explaining the Decline of Income Inequality in Brazil from 1976 to 1996,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Mimeo, 1998.

② Besley Timothy and Robin Burgess. Halving Global Pover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Balisacan, Arsenio, 2003.

③ 魏众、B. 古斯塔夫森:《中国转型时期的贫困变动分析》,《经济研究》1998年第11期;李实、B. 古斯塔夫森:《中国农村贫困机率的变动分析——经济改革和快速增长时期的经验》,《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2期。

④ 陈绍华、王燕:《中国经济的增长和贫困的减少——1990~1999年趋势研究》,《财经研究》2001年第9期。

⑤ 林伯强:《中国的经济增长、贫困减少与政策选择》,《经济研究》2003年第12期。

⑥ 胡鞍钢、胡琳琳、常志霄:《中国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1978~2004)》,《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⑦ 万广华、张茵:《收入增长与不平等对我国贫困的影响》,《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⑧ 胡兵、赖景生、胡宝娣:《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缓解——基于中国农村贫困变动的实证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年第5期。

⑨ 张全红、张建华:《中国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评估》,《南方经济》2007年第5期。

⑩ Kanbur S. M. R., Measurement and Alleviation of Poverty,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ffects of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IMF Staff Papers, 1987.

⑪ 张建华:《贫困测度与政策评估——基于中国转型时期城镇贫困问题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

⑫ Morduch J., Poverty, Economic Growth, and Average Exit Time, Economic Letters, 1998.

⑬ Sen指数于1976年提出,具体公式为: $P_k(Y, z) = A \sum_{i=1}^q (q + 1 - i)(z - y_i)$ 。Sen A. K., Information Bases of Approach to Measurement, Econometrica, 1976.

⑭ 由Thon (1979)和Shorrocks (1984)在Sen指数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修订后的公式为: $P_k(Y, z) = \frac{q}{n} \sum_{i=1}^q i^k (q + 1 - i)^k \frac{z - y_i}{z}$ 。Osberg和Xu (2000)称之为SST贫困指数。

⑮ Foster J., Greer J., Thorbecke E. A., Class of Decomposable Poverty Measures, Econometrica, 1984.

Thon D., Large Sample Properties of Two Inequality Indice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1979.

Shorrocks A. F.,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by Population Subgroup, Econometrica, 1984.

Osberg I., Xu K.,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Poverty Intensity: Index Decomposition and Bootstrap Inference,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0.

⑮ Foster J., Greer J., Thorbecke E. A., Class of Decomposable Poverty Measures, Econometrica, 1984.

对缺口本身。 α 越大，计算的贫困指数越小，给予更穷的贫困人口以更大的权重。因此，参数 α 表示对贫困的厌恶程度，决策者可以通过调整 α 的数值来反映自己的偏好。

根据 Datt (1998)^① 的计算方法，在确定贫困线 z 、平均收入 μ 和收入分配的洛伦兹曲线函数 $L(\rho)$ 的条件下，FGT 贫困指数的计算也可采用公式(2)~(4)：

$$H = z/\mu \quad (2)$$

$$PG = H - (\mu/z) L(\rho) \quad (3)$$

$$SPG = \int_0^H [1 - (\mu/z)L'(\rho)]^2 d\rho \quad (4)$$

根据上述原则，世界银行提供了计算贫困指数 FGT 在线软件 (Povcal 软件)^②，代入具体的贫困线及相应的购买力指数，便可分别计算出各年度的贫困测度指数。

(二) 1981年~2005年我国贫困程度的测算

在采用 Povcal 软件计算过程中，需要给定贫困线以及相应年份的美元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指数。按照国际惯例，本研究采用以收入为标准的绝对贫困线^③，分别将 2.15 美元/日和 1.08 美元/日设定为城镇和农村的贫困线标准。1980 年~2007 年美元人民币购买力评价指数详见附录 A。^④

将设定的贫困线及相应年份的购买力平价指数代入 Povcal 软件^⑤，分别计算出我国城镇与农村地区的贫困指数，计算结果如表 1 所示，其中个别年份的数据有缺失。

表 1 中，贫困人口指数 H 表示低于当年贫困线的人口比重，相对来说贫困人口指数是 FGT 指数中指标值最大的。贫困缺口 PG 表示贫困的程度，即贫困人口与贫困线间的平均距离。贫困缺口是贫困赤字的度量，表示为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线所需的货币转移支付量。平方贫困距比率 SPG 指标取值相对最小，其描述贫困严重程度，是贫困人口到贫困线距离的平方值，越是贫困的人在指标计算中权重越大。因此，也认为该指标考察了贫困人口中的不均等状况。FGT 指数计算值也恰好证明： α 越大，计算的贫困指数越小，给予更穷的贫困人口以更大的权重。

表 1 1981 年~2005 年我国城镇及农村地区贫困指数

年份	城镇贫困指数 (%)				农村贫困指数 (%)			
	H	PG	SPG	Gini	H	PG	SPG	Gini
1981	2.62	0.51	0.22	18.46	9.02	1.64	0.52	24.73
1984	6.11	0.84	0.25	17.79	10.79	1.8	0.42	36.69
1985	—	—	—	—	14.36	2.9	0.82	27.12
1987	6.1	1.26	0.55	20.2	10.72	2.09	0.56	29.45

续表

年份	城镇贫困指数 (%)				农村贫困指数 (%)			
	H	PG	SPG	Gini	H	PG	SPG	Gini
1990	24.99	5.5	1.86	25.59	21.55	4.49	1.31	30.57
1992	17.61	3.56	1.25	24.17	47	14.92	6.53	32.03
1993	25.51	5.9	2.07	28.47	28.59	6.72	2.23	32.13
1994	22.89	5.45	1.97	29.22	47.99	16.63	8.1	33.84
1995	15.84	3.4	1.18	28.27	39.89	13.11	5.95	33.98
1996	11.55	2.2	0.69	29.09	11.79	2.01	0.53	33.62
1997	9.18	1.83	0.62	29.35	24.4	7.35	3.1	32.12
1998	9.73	2.34	1	29.94	25.87	7.49	3.02	33.07
1999	9.01	1.83	0.63	31.55	13.78	2.58	0.73	35.39
2002	4.14	0.89	0.36	33.46	11.54	2.06	0.56	38.02
2005	1.66	0.44	0.24	34.8	1.76	0.26	0.07	35.85

注：H——贫困人口指数；PG——贫困缺口指标；SPG——平方贫困距比率指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另外，表 1 中还计算了各年份的 Gini 系数，其主要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和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根据黄金分割律，国际上通常将 0.382 作为社会分配不平均警戒线。根据测算，我国 Gini 系数在 1981 年~2005 年间呈逐渐上升之势，已逐渐逼近警戒线，说明收入差距问题已逐渐突显。

为清晰观察我国贫困程度的演变，将表 1 中的 FGT 贫困指数与对应年份的 GDP 增长率水平列于图 1、图 2。

① Datt G., Computational Tools for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FCND Discussion Paper, 1998.

② 该在线软件可计算我国农村及城镇 1980 年~2005 年的各种贫困指数，其中部分年份数据指标有缺失。(http://www.worldbank.org/lism/povcal)

③ 为便于国际比较，1985 年世界银行对大部分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贫困线进行对比后，将购买力平价 (PPP) 的每人每天 1 美元和 2 美元 (具体应该是 1.02 美元和 2.04 美元) 作为一低一高两条贫困线标准，1993 年调整为 1.08 美元和 2.15 美元。

④ 本研究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按美元计算的人均国民产值 (GNI) 与按照购买力平价法测算的人均国民产值的比值来估算美元人民币购买力评价指数。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统计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china)

⑤ 1981 年是世界银行测算贫困指标数据中最早的一年，截至 2011 年 7 月，世界银行贫困指标测度最新数据 (世界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最新数据更新日期为 2011 年 4 月) 就只测算到 2005 年。因此，本研究所列出的数据是当前世界银行测算系统中最新的测算结果。

图1 1981年~2005年我国农村贫困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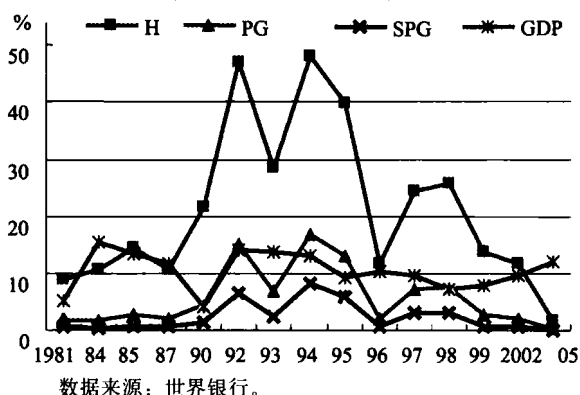


图2 1981年~2005年我国城镇贫困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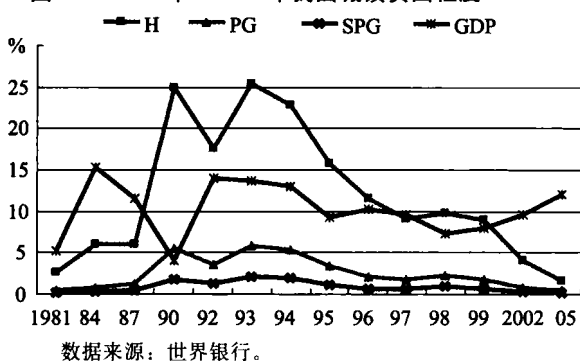


图1、图2显示贫困指数在1981年~2005年间呈现倒U型的变化规律（农村和城镇结果是一致的），贫困指标峰值都发生在1992年~1994年间，说明我国的反贫困措施的效果是显著的。自1994年以来，无论从贫困人口比重还是贫困严重程度，都呈现出明显递减之势。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能直接证明“库兹涅茨假说”，^①其原因是贫困指数主要反映贫困的程度，而并非反映不平等情况。

对比城镇地区与农村地区贫困指数，二者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镇贫困指数总体水平（变化区间在 $[0, 25.5\%]$ ）要明显低于农村贫困指数水平（变化区间在 $[0, 50\%]$ ），可见农村贫困问题确实是我国减贫工作的重点；二是城镇贫困指数自1993年之后逐步递减，单调趋势非常明显，而农村虽在1994年达到峰值，但之后贫困水平变化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以贫困人口指数为例，1997年、1998年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指数自1996年的11.79%升高至1997年的24.4%和1998年的25.87%。回顾我国的城镇化进程，1978年~1990年城镇化速度略微滞后于工业化速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城镇化速度逐渐调整到与工业化较为协调的水平；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全国各地开发区、高新技术区出现新的建设高潮，促使城镇化发展达到一个新

42

高潮。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而发生转移的农村居民通常是农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群体。因而，农村相对富裕群体的转移，导致农村地区贫困指数的较大波动，表现为贫困程度的恶化。而转移到城镇的这部分农村群体，相对于城镇收入水平来说还是较低的，因此这部分群体的加入导致城镇贫困水平的恶化。因而表现为农村、城镇贫困指标的同时扩大。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从指标的总体演变趋势看，无论农村和城镇贫困群体的状况都有所改善，贫困缺口指数有明显的递减趋势。但现有FGT指数并不能显示收入分配所造成的贫富差距，虽然贫困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贫富差距的问题却日益凸现，需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平均脱贫时间测度

Kanbur (1987) 把贫困人口中的平均收入者的脱贫时间作为一个贫困的测度指标，Morduch (1998) 对该指标进行了深化，利用瓦特贫困指数 (Watts) 的一个单调变换，得出了总人口和贫困人口的平均脱贫时间。

传统的Watts指数^②定义如下：

$$W = \frac{1}{N} \sum_{i=1}^q [\ln(z) - \ln(y_i)] \quad (5)$$

公式(5)中， q 表示个体收入 y_i 低于贫困线 z 的贫困群体人数， N 为所有人口， i 为按照个体收入排序 y_i 的次序。

平均脱贫时间记为 T_k ，计算公式如下：

$$T_k = W/g \quad (6)$$

公式(6)中， g 表示贫困群体的收入增长，并假定 $g > 0$ 。 T_k 指标表示当所有贫困群体的收入增长固定为 g 时，所有贫困群体脱离贫困的平均时间。

一个家庭的期望脱贫时间取决于家庭收入的增长及其达到给定的贫困线的时间。如果第 i 个家庭收入以每年固定的比率 g 增长，那么贫困线与第 i 个家庭的当前收入之间的关系可描述为下式：

$$z = y_i (1+g)^{t_k^i} \quad (7)$$

将公式(7)两边取对数，并解出贫困线以下贫困群体的脱贫时间 t_k^i ：

$$t_k^i \approx \frac{\ln(z) - \ln(y_i)}{g} \quad (8)$$

① 以人均财富为横坐标，以人均财富差异为纵坐标，在人均财富较低时，随着人均财富的增加，人均财富差异逐渐增大，当差异达到最大临界值之后，再随着人均财富的增长，则人均财富差异呈现逐渐下降趋势，整个变化过程呈现倒U型。

② Watts H., An Economic Definition of Poverty, In Daniel P. Moynihan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

而贫困线以上的贫困群体的脱贫时间 $t_k^* = 0$ 。其中，公式(8)中应用了近似替代 $\ln(1+g) \approx g$ 。^①如采用贫困群体的平均收入来计算脱贫时间，即

$$t_k^* \approx \frac{\ln(z) - \ln(\mu_p)}{g} = T_k \frac{N}{q} = T_k H \quad (9)$$

t_k^* 表示贫困群体平均脱贫时间。其中 μ_p 表示贫困群体的平均收入。本研究可以通过 Povcal 软件计算出不同贫困线水平下的 Watts 指数，因此可直接带入公式(6)计算平均脱贫时间，然后代入公式(9)计算出贫困群体的平均脱贫时间。

四、1981年~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减贫效应的实证测算及分析

本小节通过测算1981年~2005年的我国城镇及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时间，来考察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为了能够直观对比不同年份脱贫时间的差异及敏感性，本研究设定一低一高两条贫困线组成贫困区间。^②鉴于城镇生活成本要高于农村，本研究设定农村贫困线分别为1美元、1.5美元；城镇贫困线分别为2美元、2.5美元。将 Watts 指标数据、^③经济增长率、实际收入增长率^④代入公式(6)~公式(9)。计算出1981年~2005年的我国农村及城镇脱贫时间，计算结果见表2、表3所示。

表2 1981年~2005年中国农村贫困趋势

年份	H (%)		Watts		t_k^* (年)	
	H ₁	H _{1.5}	W ₁	W _{1.5}	T ₁	T _{1.5}
1981	5.95	24.56	0.0135	0.0723	2.7	3.5
1984	7.61	26.7	0.0128	0.0793	1.3	2.3
1985	10.74	32.31	0.0236	0.1068	1.7	2.5
1987	8.3	23.75	0.0177	0.0792	4.4	6.9
1990	16.35	44.8	0.0363	0.1592	7.4	11.8
1992	39.92	70.15	0.1657	0.3937	4.9	6.6
1993	22.31	54.9	0.0611	0.2161	6.4	9.2
1994	41.11	70.78	0.202	0.4358	16.0	20.0
1995	33.98	61.29	0.1502	0.3462	6.5	8.4
1996	8	27.92	0.0142	0.0819	1.2	2.0
1997	20.24	42.38	0.0763	0.21	12.0	15.7
1998	21.35	44.91	0.0747	0.2134	28.5	38.7
1999	9.84	29.76	0.0194	0.0935	3.9	6.2
2002	8.07	25.88	0.0141	0.0783	3.4	5.8
2005	9.7	8.47	0.0028	0.0161	0.4	2.9

数据来源：GDP、实际收入数据取自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Watts 指数值由世界银行贫困指数计算软件 Povcal 在线计算得到。

表2显示农村减贫效果特征：(1)1980年代~1990年代，随着贫困水平的加剧，脱贫时间也呈现递增趋势，表现为减贫效果较差。(2)1994年、1997年和1998年的脱贫时间变化异常，特别是1998年脱贫时间区间高达[28.5, 38.7]，这与1997年和1998年的城镇化进程有关。城镇化将相对富裕的农村群体变为城镇群体，剩余农村群体贫困程度更深，也必然需要更久的时间脱贫。(3)从整体趋势看，无论采用1美元贫困线还是1.5美元贫困线，FGT 指数和贫困群体脱贫时间指数都表明，我国农村人口的贫困状况从1981年到2005年趋于缓解，因此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是显著的。

表3 1981年~2005年中国城镇贫困趋势^⑤

年份	H (%)		Watts		t_k^* (年)	
	H ₂	H _{2.5}	W ₂	W _{2.5}	T ₂	T _{2.5}
1981	1.79	5.91	0.004	0.0132	3.1	3.1
1984	3.8	14.46	0.007	0.0247	2.3	2.2
1987	4.36	16.98	0.0106	0.0264	4.3	2.8
1990	20.21	35.33	0.0512	0.114	3.0	3.8
1992	13.41	28.44	0.0349	0.0788	1.6	1.7
1993	20.92	36	0.0576	0.1192	2.6	3.2
1994	18.87	32.17	0.0533	0.1096	6.4	7.7
1995	12.49	24.08	0.0322	0.072	3.6	4.1
1996	8.76	18.7	0.0197	0.0489	6.6	7.6
1997	6.94	15.13	0.0176	0.0396	11.7	12.1
1998	7.68	15.14	0.02	0.0452	4.4	5.1
1999	6.9	14.51	0.0176	0.0402	3.6	3.9
2002	3.1	7.23	0.0086	0.0209	6.6	6.9
2005	1.28	2.87	0.0039	0.0075	5.3	4.5

数据来源：同表2。

- ① 取 Taloy 展开的第一项作为近似值。
- ② 目前我国实际城镇贫困线为2.15美元，农村贫困线为1.05美元。贫困线从1.0美元至1.5美元以及从2.0美元至2.5美元的设定，仅为考察我国贫困现象的敏感度。
- ③ Watts 指标数据利用 Povcal 软件一并计算得到，具体数据参见附录。
- ④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2~2006)查取不变价 GDP 计算 GDP 实际增长率；查取农村、城镇人口实际可支配收入分别计算农村、城镇实际收入增长率。
- ⑤ 本研究测算结果与现有研究测算结果有较大差异。造成差异的原因：一是本研究是根据世界银行测度数据计算的每年的 PPP 购买力指数，并带入计算；而现有研究则采用宾夕法尼亚大学测度的结果，二者的测算结果具有一定偏差。二是本研究计算过程中采用的经济增长数据是每年的不变价 GDP 实际增长率，而现有研究设定了固定3%的经济增长率。具体差异可对比参考张建华(2010)。

表3显示城镇减贫效果特征:(1)除1997年的数据显著增大以外,平均脱贫时间数值整体较为平稳,并没有显著递减趋势,结果直接表明我国城镇减贫效果并不显著。当然,这与城镇化进程对我国城镇贫困群体的影响有关。(2)城镇贫困群体平均脱贫时间在个别年份出现逆转,如2005年当贫困线的设定由2美元调整至2.5美元,结果贫困群体平均脱贫时间却缩短了,即出现了逆向变化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在农村贫困分析结果中未曾出现。进一步分析,出现这一结果极大的可能性是由于在城镇收入处于2~2.5美元/日之间的收入群体比例较大,当贫困线设定发生变化时,便会使以上群体变为贫困群体。而这部分群体虽处于贫困线下,但距离贫困线较为接近,从而使得贫困群体的平均脱贫时间较之前更短。该现象说明,目前我国城镇减贫工作有较大的潜在危机,存在着较大比例的易反贫群体。在结论部分会对此有更为详尽的解释。

需要说明的是从绝对数值上,本研究计算出的脱贫时间也要低于现有研究的测度。例如本研究测算1999年城镇贫困群体脱贫时间^①在2美元水平时为3.6年,在2.5美元时为3.9年;现有研究测算结果在1美元水平时为7.41年,在1.5美元时为8.32年。其原因分析如下:本研究计算的经济增长率是按照对应年份的可比价GDP实际增长率计算的,而现有研究采用了固定3%的经济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除1997年(2.17%)外,都高于3%,且高出幅度较大。因此,实际脱贫时间肯定比3%假定下的脱贫时间要短。

对比农村与城镇贫困水平及减贫效果的分析结果可发现:一是,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当贫困线从1美元提高到1.5美元或从2美元提高到2.5美元时,贫困发生率会提高2倍以上,贫困缺口会提高3倍左右。这表明我国的FGT贫困指数对贫困线敏感度较高。说明贫困群体具有较高的脆弱性,如果贫困线稍有提高,或者由于外部冲击,如疾病、失业等情况发生,就会有大量的人口陷入贫困,贫困缺口也急剧上升。二是,当贫困线提高后城镇群体在高贫困线时的平均脱贫时间较低贫困线时的平均脱贫时间有低有高,大概在0.7~1.3倍之间;而农村群体则在高贫困线时的脱贫时间普遍高于在低贫困线时的脱贫时间,大约在1.3~2倍,说明农村在贫困线以上并非常接近贫困线的贫困群体比例要高于城镇,农村贫困问题要比城镇贫困问题更具严重性。三是,当我国城镇贫困线从2美元提升至2.5美元时,贫困群体的脱贫时间并未有显著的增加,仅出现了小范围的波动,说明在我国城镇非贫困群体中,有较多的人接近2.5美元/日这一收入水平,他们仅仅是挣扎于贫困线之上,这些人往往是最容易返贫的群体。综上可见,我国

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是显著的,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本研究得到的有关脱贫时间的相关结论与现有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分析原因在于脱贫时间指数是对贫困线以下贫困群体收入增长的总和考察,当提高贫困线后,理论上一方面确实拉大了原本处于贫困线以下贫困群体的贫困缺口,因此这一部分贫困群体的脱贫时间显然要增加;但另一方面,由于贫困线的提高,会有更多的群体处于贫困线以下成为新的贫困群体,而这一部分人如果距离贫困线相对较近,那么这一部分人的脱贫时间相对较短,因此会使贫困群体平均脱贫时间有减少的趋势。因此,从理论上贫困线的变化不一定必然导致贫困群体平均脱贫时间的增加。而本研究的实证结果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五、结论与建议

经济增长缓解贫困是通过增加收入和扩大就业两个渠道来发挥作用的,我国经济增长对贫困治理的贡献主要源于制度变革的巨大推动力。一方面,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和体制变革,打破了人民公社时期平均主义分配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加之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以及购销体系的形成,农民收入迅速提高;^②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确立,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1984年起,我国允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并逐步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带来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从1994年开始政府对农业实施了一系列的补贴政策,2006年彻底取消了农业税,进一步提高了农民收入。因此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在减贫工作中取得的骄人战绩,其实质是短缺经济背景下、农民普遍贫困的状态下,人民需求的制度释放。

近年来中国的减贫速度不断放缓,2001年~2005年每年减少的贫困人口仅为169万,还不到1978年~1985年期间每年减少贫困人口的1/10。2003年,由于返贫者增多,绝对贫困人口反而增加了80万人。正如上文实证分析,城镇化一方面缓解了我国农村贫困,一方面形成

^① 以张建华(2010)的测算结果为例进行对比分析,在其研究中只测算了城镇脱贫时间,时间范围是1991年~2001年,其中最近的可比较年份为1999年。

^②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79年的160.7元增加到1985年的397.6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了87.23%,年均增长率为11.02%。这一时期按照国家统计局贫困线计算,农村贫困发生率由30.7%下降到14.8%,贫困人口由2.5亿人,下降到1.25亿人,下降了50%,平均每年下降速度为9.43%。

了新的城市贫困，由此凸显的脆弱性已经成为扶贫工作的突出问题。所谓脆弱性是个人或家庭受到不利风险冲击而陷入贫困或者陷入更深贫困的可能性或概率（胡永和、蒋永穆，2009），^①这种风险是以“因教致贫”、“因病致贫”、“经济波动”为形式的对低收入者收入的剥夺甚至再次剥夺，更重要的是贫困人群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因此脆弱性不仅是贫困的表现，而且也是贫困的原因。而原因背后则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这些公共品的政府提供的缺失，限制了贫困人口脱贫的能力，因此经济增长的福利难以“涓流”到穷人，这也解释了为何经济增长对城镇减贫的影响效果不明显。

过去30多年，我国政府着力解决的是收入贫困问题，这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认识规律。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短缺经济为起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最需迫切解决的问题确实是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这一时期不论从认知还是现实，

以经济高速增长缓解贫困无可厚非，并且减贫结果是显著的。当前学术界对贫困范式的认知已经从收入贫困逐步扩展到能力贫困、脆弱性和社会排斥（权力贫困），但在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上依旧存在一些误区。首先，收入分配抵消经济增长减贫效果的研究与贫困范式的认知相脱离。在研究中，人们认识到要消除能力贫困、降低脆弱性必须保证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提供，但却未将公共品提供（收入再分配）纳入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对贫困影响的测度中。其次，在政策制定中依旧狭义地以消除收入贫困为目标。^②这些偏离注定我们的扶贫工作都还是从量变的层面上开展，未能从本质上去消除贫困现象。笔者认为，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均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现阶段再分配的抵消作用要大于初次分配，因此推进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公共品供给机制才是减贫的关键所在。

附录 A 美元人民币购买力评价指数

附表 1 1980年~2007年美元人民币购买力评价指数

年份	指数	年份	指数	年份	指数	年份	指数
1980	1.136	1987	1.938	1994	2.913	2001	2.560
1981	1.273	1988	2.121	1995	2.792	2002	2.573
1982	1.455	1989	2.314	1996	2.538	2003	2.504
1983	1.682	1990	2.424	1997	2.427	2004	2.393
1984	1.760	1991	2.543	1998	2.481	2005	2.347
1985	1.786	1992	2.615	1999	2.524	2006	2.337
1986	1.774	1993	2.878	2000	2.516	2007	2.265

附录 B 中国贫困指数

附表 2 1981年~2005年中国贫困指数

农村 年份	H (%)		PG (%)		SPG (%)		Watts		Gini (%)
	H1	H1.5	P1	P1.5	S1	S1.5	W1	W1.5	
1981	5.95	24.56	1.06	5.66	0.35	1.87	0.0135	0.0723	24.73
1984	7.61	26.7	1.07	6.21	0.2	2.04	0.0128	0.0793	26.69
1985	10.74	32.31	1.93	8.24	0.48	2.99	0.0236	0.1068	27.12
1987	8.3	23.75	1.53	6.05	0.46	2.17	0.0177	0.0792	29.45
1990	16.35	44.8	3.05	12.1	0.79	4.53	0.0363	0.1592	30.57
1992	39.92	70.15	12.06	26.79	5.06	13.3	0.1657	0.3937	32.03

① 胡永和、蒋永穆：《基于脆弱性上升的中国城镇贫困现象解析》，《经济体制改革》2009年第4期。

②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指出，未来10年将把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作为扶贫开发工作首要任务。（国务院扶贫办网站）

续表

农村	H (%)		PG (%)		SPG (%)		Watts		Gini (%)
	H1	H1.5	P1	P1.5	S1	S1.5	W1	W1.5	
1993	22.31	54.9	4.85	16.1	1.48	6.49	0.0611	0.2161	32.13
1994	41.11	70.78	13.84	28.25	6.6	14.87	0.202	0.4358	33.84
1995	33.98	61.29	10.73	23.22	4.69	11.7	0.1502	0.3462	33.98
1996	8	27.92	1.23	6.49	0.31	2.04	0.0142	0.0819	33.62
1997	20.24	42.38	5.86	14.27	2.36	6.7	0.0763	0.21	33.12
1998	21.35	44.91	5.88	14.92	2.25	6.84	0.0747	0.2134	33.07
1999	9.84	29.76	1.65	7.32	0.44	2.43	0.0194	0.0935	35.39
2002	8.07	25.88	1.28	6.16	0.32	1.97	0.0141	0.0783	38.02
2005	9.7	8.47	0.24	1.44	0.063	0.39	0.0028	0.0161	35.85
城镇	H (%)		PG (%)		SPG (%)		Watts		Gini (%)
年份	H1	H1.5	P1	P1.5	S1	S1.5	W1	W1.5	
1981	1.79	5.91	0.38	1	0.18	0.35	0.004	0.0132	18.46
1984	3.8	14.46	0.56	2.11	0.18	0.55	0.007	0.0247	17.79
1987	4.36	16.98	0.96	2.29	0.47	0.86	0.0106	0.0264	20.2
1990	20.21	35.33	4.21	8.86	1.39	3.14	0.0512	0.114	25.59
1992	13.41	28.44	2.66	6.21	0.96	2.17	0.0349	0.0788	24.17
1993	20.92	36	4.59	9.3	1.57	3.48	0.0576	0.1192	28.47
1994	18.87	32.17	4.28	8.47	1.52	3.24	0.0533	0.1096	29.22
1995	12.49	24.08	2.59	5.66	0.9	2.03	0.0322	0.072	28.27
1996	8.76	18.7	1.6	3.96	0.5	1.29	0.0197	0.0489	29.09
1997	6.94	15.13	1.36	3.23	0.48	1.1	0.0176	0.0396	29.35
1998	7.68	15.14	1.86	3.71	0.82	1.51	0.02	0.0452	29.94
1999	6.9	14.51	1.37	3.18	0.48	1.1	0.0176	0.0402	31.55
2002	3.1	7.23	0.69	1.54	0.3	0.58	0.0086	0.0209	33.46
2005	1.28	2.87	0.36	0.68	0.21	0.32	0.0039	0.0075	34.8

本文作者：闫坤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轶芳是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气候与能源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国

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刘新波是中国
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
责任编辑：王姣娜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Economic Growth on Reducing Poverty

—Based on Data Analyzing from 1981 to 2005

Yan Kun Liu Yifang Liu Xinbo

Abstract: The evaluation of rural and urban average exit time index in China from 1981 to 2005 shows that the impact on poverty is significant in rural but insignificant in urban. FGT index is very sensitive to the poverty line, which shows the poor is very vulnerable. The average exit time index of the poor in urban has come under tremendous strain in some year, which shows there is possible crisis in the work for urban poverty reduction. Because there is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group that just above the poverty line and very close to it. So they return back to poverty easily.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and redistribution of income offset the alleviating poverty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bucking effect of present redistribution is greater than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Therefore, the key points of alleviating poverty are propelling equalization of the society's basic public service and perfecting the mechanism of public good supply.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alleviating poverty; Foster-Greer-Thorbecke Index; Average Exit Time Index